

《域外小说集》译介研究

叶依群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杭州 310023)

摘 要: 置于晚清文学翻译的大背景下,对鲁迅及其弟周作人译介的《域外小说集》从翻译背景、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三方面进行研究。阐述了《域外小说集》在引进新的文类,选择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作品和采取忠实于原作的直译方法上的开拓意识,为晚清翻译树立了良好的译风,也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周氏兄弟;鲁迅;域外小说集;译介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3)02-0088-04

On translation of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YE Yiqun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by Zhou brothers is studi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lation; the choice of original works and the method of translation. Zhou brothers introduced a new literal style, selected works by people of weak and small nations, adopted literal translation, which i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doing so, their pioneering consciousness is clearly stated. All these set a good example for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our moder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Key words: Zhou brothers; lu xun;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translation

在友人蒋抑危的资助下,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和第二集于 1909 年 3 月和 7 月先后在日本东京出版,署名为“会稽周氏兄弟纂译”。两集共收译作 16 篇,鲁迅翻译了其中的 3 篇^[1],并作了一个“虽寥寥数语,但志向高远、气象阔大的”序^{[2]26}。时隔 12 年后的 1921 年,《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和第二集经过作者的增订、改版,把原来的两册合二为一,又加入了周作人 1909 年后用文言文翻译的 21 篇短篇小说,共计 37 篇,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撰写了序言,由上海群益书社重新出版。尽管《域外小说集》实际的翻译工作大部分是周作人完成的,但所有译作经鲁迅审定、修改和润色,并为之作

收稿日期: 2012-09-22

作者简介: 叶依群(1963—),女,浙江省松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与翻译教学研究。

序;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翻译方法的选择等方面的贡献。鲁迅很早便注意到“叫喊和反抗的作家”^[3],首开先河地选择了北欧、东欧及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并强调“弗失文情”的直译方法。《域外小说集》得到译界很高的评价,被誉为“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重大文献”^{[4]171},对鲁迅本人和中国的翻译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这本书的销量差强人意,初版时第一册和第二册分别只售出20本和21本^[5],流传范围很小,在当时译书丛中,《域外小说集》只是沧海一粟,并没有在晚清翻译界产生多大影响,但却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和赞赏。《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部以多国多位作家短篇小说合集形式译介的著作;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代表了近代后期翻译文学的一种新倾向;表达鲁迅直译的观点,成为鲁迅译介活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鲁迅翻译观形成的标志。

1 翻译背景——“迟暮译界”中的报春燕

鲁迅的译介生涯从1903年22岁时翻译雨果的《哀尘》开始,到1936年拖着重病赶译《死魂灵》为止,持续了33年之久。按其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的不同,鲁迅的译介活动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03—1908),追求科学救国梦;中期(1909—1926),翻译策略从意译向直译转化;晚期(1927—1936),探索苏俄文学与文学理论^[6]。

从时间上看,《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正处于鲁迅译介生涯早期和中期的过渡期。鲁迅刚到日本留学时,对林纾翻译的小说很热心,一有他新出的书,便一定买来阅读,可以说,鲁迅走上小说翻译和创作的道路,林纾的影响功不可没。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倡导科学救国,短短几年便翻译了12部作品,包括小说、专著、诗歌、论文等。翻译介绍以科普编译、科学小说为主。其中科学小说是这一时期译介的重心,主要有《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1903年),《北极探险记》(1904年)及《造人术》(1905年)等。鲁迅希望通过直译欧洲文化让国人接触本原的外国文学和思想,涵养国人新的国民性,建立新的民族文化,以推动社会变革进化。

在翻译选材方面,国内译界流行翻译西方的政治、科普、侦探、言情等通俗小说,这些作品已有广泛的读者群。当时林译小说很受欢迎,主要取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学,并没有关注其他弱小民族和受压迫民族的作品。鲁迅想要弥补这一不足,开始专注于“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选材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前列。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里提到过译介此书的目的,当时鲁迅在日本留学,接触到了一些异域的文化,眼界也逐渐开阔,觉得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7],带着这种茫然的希望,开始尝试介绍外国文学。

在翻译方法上,由于当时大多数译者外语水平不高,翻译态度也不严肃,为降低译作难度,迎合读者的需要,主要采取删译、增译、改译等方法。以翻译家林纾为主的译界,形成了自由无度的意译风气和规范,随意改动、删减原作,翻译时只有译者和读者,作者是不重要的。译者只要把基本的意思用读者易于接受、更为习惯的方式传达就可以了。随着在日本对更多翻译准确且完整的日译本的接触,鲁迅对这种随意删减的译述方式越来越不满^[8],认为清末译界虽表面繁荣,实则进入“迟暮”之境。1907—1908年间鲁迅兄弟着手翻译《域外小说集》时,积聚的无奈和不妥之感转为明确不满,坚决主张“直译”,希望给晚清的意译局面带去清新的空气和新的转向。当时林纾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很受中国读者欢迎,鲁迅认为林译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9]。鲁迅从最初受林译小说的影响,到模仿林译小说,再发展到后来对林译小说的不满,可见鲁迅翻译思想的不断成熟与深化。鲁迅从翻译《域外小说集》起,就确定了直译的信念,此后他一直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坚守着自己的这一信念。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序》中明确说明了翻译目的是将“异域文术新宗”介绍到中国,通过引入“性解思惟”来挽救中国译界的“迟暮之感”;为“弗失文情”,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4]174}。可以说《域外小说集》的译介,是对晚清翻译选择的混乱、泛滥的意译之风的反拨,为中国读者介绍、引进了新的文学资源。

2 翻译选材——“异域文苑”的奇葩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盛行,种类繁多,但良莠混杂、参差不齐,侦探、言情等消遣娱乐性作品充斥其中,阅读翻译小说成为一种消闲的方式。优秀作品凤毛麟角,整个译界缺乏主流作品。译者大多根据读者期待和个人的情趣爱好选择翻译的作品,随意性较大。结果当时翻译的小说,以通俗为主,且为外国二三流的文学作品,中国读者难以从中真正领略到域外文学、文化的风貌和艺术的真谛^[10]。正因如此,鲁迅提出将异域文苑中富有新的生命力之佳作移植进古老的中国,改造中国的文学。有了明确的翻译选材目标,周氏兄弟按自己的标准选择欧洲现代的严肃文学作品,着眼于旧俄作家暴露黑暗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及被压迫弱小民族反抗与呐喊的小说。鲁迅负责《域外小说集》篇目的选定,出于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希望通过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从西方引进新文化的火种,烛照中国前行的道路。《域外小说集》将译介重点转向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如芬兰,波兰和波西尼亚等国家,同时选择批判现实主义的名家名著,有俄国的安特列夫,迦尔洵,契科夫,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美国的爱伦坡等。因为这些作品反抗强权、反抗压迫,贴近中国的现实,由此开创了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路径。《域外小说集》共收集了 7 个国家 10 位作家的 16 篇作品(表 1)。

表 1 《域外小说集》中作者、作品及国家一览

Table 1 Statistics of authors, works and countries in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国家	英国	美国	法国	俄国	波兰	波西尼亚	芬兰
作者数	1	1	1	4	1	1	1
作品数	1	1	1	7	3	2	1

“收录至审慎”是周氏兄弟的选材原则,通过对原著的严格筛选,周氏兄弟选择的作品大多为 19 世纪中后期和 20 世纪初欧洲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后的现代文学思潮^[11]。从审美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漫》和《默》是象征主义杰作,《四日》有意识流小说的风采,委实都是“异域文苑”的奇葩。通过这些译作,不难看出译者的思想倾向和用意所在,从单纯偏重作品的政治性到注意作品的艺术性,体现了鲁迅“异域文苑新宗,自此始入中华”的翻译思想。这些作品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本身的文学艺术技巧也比较高^[12]。

在《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前,翻译的小说几乎都是长篇,如影响极大的林纾译作《黑奴呼天录》(1901 年)等。《域外小说集》选译的作品均为短篇,就文类来说,多为近世小品,虽然篇幅短小,但艺术性较高。周氏兄弟虽然知道读书人喜好章回体,但他们仍选取大量的短篇小说来译介,希望通过介绍外国先进的文学观念,引进新的小说文类,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它使短篇小说集中地出现在国人面前,中国读者第一次领略到不同于传统长篇的短小精悍的新文体风格,开拓了中国短篇小说的新时代^[6]。

3 翻译方式——“弗失文情”的直译方法

翻译方式不单单是处理语言的方式。晚清翻译没有一定的规范,译者各随其便,没有把“忠实于原文”放在心上。晚清的译界盛行编译、改译,甚至是胡译、乱译,除了跟当时的政治文化需求相关外,各种复杂的因素卷入其中。时代的变迁,个人的价值追求、文化理想和政治关怀,都影响、制约甚至决定个人对翻译方式的选择。变革者急于事功,想把他们所要的西书尽快地译过来,没有时间逐字逐句抠着原文翻译,只能删繁就简,把原文的大意或重要内容译出来就了事^[13];大多数译者考虑到中国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审美情趣及道德伦理观念等文学接受方面的原因,对原作的情节、叙事结构等方面作了重大的增删和改译。当时翻译人才稀缺,既通汉语、又通外语的人寥寥无几,因此,不少欧美文学作品大都从英译本和日译本转译成汉语。

当时盛行的林译小说就是用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翻译的:由林纾精通外语的朋友口授原文意思,他进行修改润色,再运用编译、改译的手段体现原著的细节和韵味。在世界各国翻译传统里,林纾模式算得

上是最随心所欲地增删改写原作的那一类。其众所周知的翻译特征,即归化程度极高。这种翻译模式,译者基本没有原作意识,只关心能否译出一个情节曲折动人、文笔优美的故事。这种翻译方法不利于读者正确了解外国文学和文化。

直译和意译的分歧究其实是翻译主体的文化依附在语言层面的体现,是以主体文化还是异质文化为本位的具体体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14]。鲁迅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别求新声于异邦”,译介国外原质性文化,翻译时既要输入“异域文术新宗”,同时还要翻译语言的“弗失文情”,他反省和检讨了以往的翻译方式,从编译和改译走向直译,并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中付诸实施。

直译是鲁迅翻译理论的核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遭梁实秋、赵景琛等人的批评,梁、赵认为鲁迅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晚清翻译家林纾、梁启超等使用“译意不译词”的翻译策略,为迎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对原作的题目、人名和情节结构进行改译,严复把这种意译方法称为“达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直译是从翻译的具体操作层面提出来的,这种翻译观是基于鲁迅追求“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外来文化的原质性^[15]。周氏兄弟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倡导和践行了当时罕见的严格的直译策略,不仅保留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对章节格式也没有作任何的改动。

许寿棠先生曾将鲁迅所译的3篇小说与德文译本进行了对照,认为字字忠实,一丝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16]。在翻译人名和地名时,周氏兄弟采取了音译法,而不是当时盛行的改用中国人名和地名,直译成了《域外小说集》翻译的一大特色。《域外小说集》开创了近代文言直译小说的先河,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便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并在他的译作序言或后记中阐明。直译方法的提出和实践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能够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使用不同的翻译手段。在当时几乎意译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域外小说集》中罕见的严格直译,包括人名、地名、专名用音译之法,部分文化历史内涵丰富的名词解释,小说篇章结构、小说形式样态、人物对话、翻译单位、小说虚实情节的照译等,乃是破天荒的创举,一个大胆的反拨^{[2]29}。鲁迅也意识到,为了追求“异域化”的效果,直译是力图保持原汁原味,保持异域情调的一种翻译方式。中国的直译从《域外小说集》发源,但由于意译的长期影响,采用直译方法翻译的作品不为国人接受,在此后的十年里,直译并没有引起预期的反响,但正是由于鲁迅等人的不懈努力,直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占领上风,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在“五四”以后成为绝大多数翻译家自觉运用的方法。

4 结 语

周氏兄弟本着“审慎”的目光精心挑选弱小民族的新文学,希望突破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其选材兼顾了启蒙的功利和高标准的审美,表现出他们独特的文学眼光和文学意识,体现了为启蒙中国国民而务实奉献的精神。在传统翻译集中在中、长篇小说,国人也习惯了阅读这一文类的情况下,周氏兄弟的翻译路线却逆大流而行,转向短篇的纯文学,首次以多国多位作家短篇小说合集的形式译介,对短篇小说这种近现代文类进行了推介,培养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意译一统天下的晚清,周氏兄弟提出直译,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忠实地将异域文坛的奇葩输入“华土”。虽然受当时社会文化大环境及其翻译规范的制约,就书的销量看,《域外小说集》没有引起预期的反响,读者接受是失败的,但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的历史意义不容抹灭^[17]。它所开辟的一代直译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译界开辟了新的道路,并奠定了译介被压迫民族作家作品的基础。历史见证了周氏兄弟的卓见与胆识,因为20世纪20年代之后直至90年代,《域外小说集》一印再印,其商业上的成功是20世纪其他外国短篇小说文集无法比拟的,更不用提它收获的巨大的学术关注^[18],这也成为多年来对《域外小说集》研究经久不衰的原因。